

[美] 内尔·诺丁斯 著

Nel Noddings

WHEN SCHOOL REFORM GOES WRONG

当学校改革 走入误区

侯晶晶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014033756

G40
125

当学校改革 走入误区

WHEN SCHOOL REFORM GOES WRONG

侯晶晶 译



北航

C1722118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G40

125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周益群
版式设计 孙欢欢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学校改革走入误区 / (美) 诺丁斯著; 侯晶晶译.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 12
书名原文: When school reform goes wrong
ISBN 978 - 7 - 5041 - 8131 - 2

I. ①当… II. ①诺… ②侯… III. ①学校教育—教
育改革—研究 IV. ①G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1913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11 - 7081 号

当学校改革走入误区

DANG XUEXIAO GAIGE ZOURU WUQU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21
传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69 毫米 × 239 毫米 16 开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张	7.5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6 千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Original English Title:

When school reform goes wrong

By Nel Noddings

Copyright © 2007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First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edition i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quality of the translation.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shall take all necessary steps to secure copyright in the Translated Work in each country it is distributed.

本书中文版由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授权教育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并负责译作的内容和质量。未经出版社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航

C1722118

[美] 内尔·诺丁斯 著

Nel Noddings

本译著系

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资助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880029）阶段成果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者前言

很高兴我的很多著作将有机会以中文出版。诚挚地希望这些作品会对中国读者有所帮助。我愿借此机会对我的著作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几条相互连接的重要线索贯穿着我在哲学和教育学方面的著述。1984年问世的《关心：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女性视角》（*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1984, 2nd ed., 2003）一书引领了后来大量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探讨关怀伦理的本质、关怀在教学中的运用，以及关怀理论对社会政策的影响等问题。在我刚刚完成的一本书中，我重返关怀伦理的研究。在书中，我以进化论为指导，从女性经验的角度追溯道德发展。我发现道德发展与母性本能直接相关。事实是，关怀伦理更自然地女性经验中产生。当然这并不等于宣称男性不可能投身于关怀或关怀伦理。就像很多女性完全接受并且身体力行公正伦理一样，很多男性也认同关怀伦理。

我的另外一个重要学术兴趣集中在宗教和精神问题上。与我的第一本关怀著作密切相关，1989年出版的《女性与恶》(*Women and Evil*, 1989)一书从女性的视角分析了“罪恶”这一概念。在那本书里，我审视历史上各种宗教组织，特别是基督教组织，对女性的压迫、对两性不平等地位的维护。从女性的视野出发，我认为罪恶应该包括有目的的给他人施加痛苦的行为、被迫的分离，以及孤苦无助的人生状态。

对宗教的探索得以在下一本书中继续。1993年的《培养智慧的信仰与不信仰》(*Educating for Intelligent Belief or Unbelief*, 1993)主张这样一种教育：帮助年轻一代分辨理解与宗教有关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我的目的是指导学生们如何在接受或者拒绝某些传统宗教理论和习俗的过程中运用智慧，也同时让他们相信有意义的符合道德的人生并不一定依赖宗教教条。除了这本书以外，我还在2006年出版的《批判性课程：学校应该教授哪些知识》(*Critical Lessons: What Our Schools Should Teach*, 2006)等其他几本著作和很多文章中探讨了如何运用批判性思维理解宗教和精神问题。

以关怀伦理为基础，我对道德教育这一命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2002年的《培养有道德的人：以关怀伦理替代品格教育》(*Educating Moral People: A Caring Alternative to Character Education*, 2002)以及其他大量文章中，我阐述了这样一个道德教育模式：以榜样、对话、实践和求证为途径培养关心人的人。这个道德教育模式是对以灌输美德为主的传统人格教育的一个超越。

作为一位教育哲学家，我还对教育哲学领域内的其他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1995年的《教育哲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995, 2nd ed., 2006)即是对这个学科领域的一个基本的分析介绍。当然，这个分析是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视野进行的。人生意义、人类幸福等重要哲学命题得以在2003年出版的《幸福与教育》(*Happiness and Education*, 2003)一书中进一步讨论。在这本书和其他一些文章中我试图回答怎样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问题。

我最近几年的大量学术研究集中在和平运动和全球化中的教育问题。2005年出版的著作《培养具有全球意识的公民》(*Educating Citizens for Global Awareness*, 2005)反映了我在这方面的思考。在不少文章中我反驳了战争可以符合道德、符合正义的论调。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将战争或者暴力行为作为解决争议和冲突的一种途径。这一立场当然和我一贯的“关怀”主张相一致。关怀而非暴力才是完美人生与和谐社会的基石。

在探讨全球化公民的过程中，我还对“地方”这一概念进行了研究。事实上，哲学家们对这个概念的兴趣正在增加。这当然与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对环境问题和地球命运的忧思有关。理解并且欣赏人们对自己家园的热爱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对待不同于我们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人生兴趣和文化习俗。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主要问题，作为一位前高中数学教师，我对数学的由衷兴趣反映在我很多的哲学和教育论述之中。读者们会发现，很多地方我运用了大量与数学和数学教学有关的例子。

在结束这个简短的前言之际，让我再一次表达对我的著作中文版出版的兴奋和感激之情。我向所有的翻译者和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同仁们致敬！

内尔·诺丁斯
2009年2月

前言

美国的公立学校正受到抨击。关于学生考试成绩低下以及“数学课、科学课不足”的忧虑，导致教育决策者抛出了一套体系，这个体系是反智性的、反民主的，令人忧惧。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情况。

本书的主旨不是研究教育改革史，也不是实证研究的综述，它是一部完整的论著。本书的主旨在于邀请多方读者来对话，而且作者希望能引起行动。本书的论述极少被脚注或括号注释打断，但书后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较简略的书目。这些著作有一些和本书观点一致，有些并不一致。

我从事教育已有半个多世纪，具体身份包括各个阶段的老师——从五年级到高中的数学老师、研究生院的老师，还包括教育管理者、教师教育培训者以及教育哲学家。我撰写本书是基于这样的经历，以及对学生的深刻关切。我的观点可能未必正确，而且就像我对我的学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必

须谨记：有理性的人们对于有矛盾的问题可能意见不尽一致，但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美国的公立教育就真的处于困境中。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民主，我们必须认真应对这些问题。

序 言

21 世纪的头十年中，指导美国学校运作的是这样一些国家政策，这些政策有些人认为将提升教师的能力和学生的水平，而另外一些人却坚信这些政策正威胁着——可能正毁掉——美国的教育。这些存在争议的政策见诸 2002 年开始实施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该法案旨在强化 1965 年颁布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虽颁布于 2002 年，但是现行的改革运动之精神早在此法案提出前十年左右就已存在。这种精神就是更加强调学术课程、问责以及标准化考试。

《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当初作为联邦法案被提出，旨在弥合贫富差距，方略是为大量招收贫困学生的学校提供所需要的资源。

今天的决策者不满于这样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尽管他们已着重致力于弥合白人与黑人及南美

裔人之间的成就差距，他们学业成绩上的巨大鸿沟依然存在。在《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条款当中还隐含着决策者的另一种不悦，它关乎《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规定的款项应用结果——用于支付追加资源的那些款项至今仍然没有产生更好的分数。而《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的规划目的即在于保证联邦的经济资源得以有效地运用。换言之，真实的结果应该是更好的成绩。

在此序言中，作者想邀请读者批判性地思考《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背后的理念，使之得以出台的 reform 运动及其实际运作情况。请读者假想自己曾参与了致使《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出台的一系列对话，再请假想美国的决策者在 21 世纪之初告诉你，他们想使美国教育实现两种目标：（1）消除或减少白人学生与黑人及南美裔学生之间的学业差距。（2）有可靠证据显示联邦政府的资金在美国学校中得到很好的运用。那么，在支持这些目标之前，你想提出哪些问题？本书作者将提示一些问题，由此构成本书各章的讨论框架。

首先，我们可以质疑关于联邦资金合理使用的证据仅在于提高学习成绩这种假设。使用财政经费还有没有其他值得追求的有价值的目标？比如说，可以设想联邦资金被投放到城区学校，用来维修破旧不堪的学校设施，在校内提供包括牙科在内的医疗诊所，保证每一个学生上每门课都有课本，在每个教室里都保证每位学生有座椅可用。这样的资金使用方式很可能会促进学生提高学业成绩，不过如果没有取得这样的效果，那么是否可以断定钱就浪费了？

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已持续了 40 多年：美国城区学校的体育设施与服务经常低于一般水平。有批评人士指出，这种糟糕的情形很可能是学业成绩差的原因。但这可能不是全部的答案。在有些州和地区，弱校的预算已得到显著的提升，现在物质条件已较好 [例如，在新泽西州的许多“阿伯特学校”（Abbott districts）里，物质条件就已得到改善]，但是学业成绩并没有提高。于是，有一些批评家坚持认为“也许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①

① 阿伯特学校是指新泽西州有些校区的中小学获得了补救措施，以确保学生获得与新泽西州法律规定相适应的公众教育。1985 年，教育法中心曾就薄弱校的教育质量问题提起诉讼，最终形成了“阿伯特”裁决。该裁决指出，新泽西州贫困社区的公立初等与中等教育是不达标的，也是违宪的。自此政府开始为该州的 30 多个校区提供补救资源。——译者注

也许，钱（增加经费）不是解决问题、提高学习成绩的办法——或者至少不是全部的解决之道，但提供合适的设施与资源是合宜之事。我们给饥饿的孩子提供食物，并不是因为要他们在考试中取得更好的考试成绩，而是因为他们饥饿。提供食物是应然之事。我们愿意自己的孩子来接受的物质条件和资源，就应该提供给所有的儿童。这是合宜之事。为贫困学生改善条件，可能就是在提高其学习成绩，但更好的学校教育条件并不是以更高的学习成绩为前提。

我们可能还会问：如果有待解决的问题主要存在于招收贫困学生的学校，那为什么《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提出的解决方案却着眼于所有的学校？为什么不聚焦于有问题境况的学校，专门对此进行甄别和分析呢？政策制定者对这个合乎情理的质疑是这样回应的，他们承认弥合学业差距不是他们唯一的忧虑。他们说：“我们的学校在衰落。”是所有学校吗？这么指责有何证据呢？

那些声称学校教育普遍退步的决策者经常引用《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作为论据。这份发表于1983年的报告宣称美国的学校正淹没在“不断增高的平庸浪潮中”，报告中耸人听闻的言论已被许多学者质疑。除了其他的抱怨，该报告的作者还对学术能力评估考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SAT）成绩的下降表示担忧。但是理智的观察者会注意到，正如其他标准化考试一样，SAT建立的常模也取决于考生人数。当考生人数显著增加时，不难预料中数、众数等常模会有所改变。这些改变是标准化测试自应考虑的一个因素。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SAT，是否值得庆贺不得而知，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该报告还担忧地指出，报考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的考生比例有所下降。我们应该为此担忧吗？是否所有的学生都需要学这些课程？为什么？这是应该要引起认真分析和讨论的严肃问题。我们大概都认同：今日的公民必须具有科学素养。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那种传统的高深的物理、化学课程对于科学素养是否必需？这些课程是否反而会打消学生对于科学问题的兴趣，从而阻碍科学素养的养成？该报告基于观察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获得SAT高分者的绝对人数有所下降。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可能会问，那些既有能力又有兴趣从事学术学习的学生有没有从学校教育中获得足够的时间和关注。也许逼着所有的学生学相对只适合较少学生的课程，这种做法不仅伤害了那些真正需要这种学术化课程的学生，同时也伤

害了可能会从其他课程受益的学生。

要求所有学生修习传统学术课程的思潮早在《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出台之前就已存在。这种潮流是《国家在危急中》报告催生的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它和《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主张的标准化课程相互匹配。决策者忽略了诸如教育目的、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等深层次问题，只是一味认为所有学生都应该修习一度只向较少学生开放的课程。提出这一要求，名义上是为了平等。所以，我们必须要花些时间来分析平等的概念，相同是否保证平等，抑或相同会不会反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

4 前些时候，我访问了一所很好的独立初等学校。我正在办公室和校长聊天，一个小女孩跑进了办公室，爬到了空椅子上开始和校长说话，显然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那位校长热情地欢迎了这个叫侯普（Hope）的小女孩。很快，这个孩子的老师也跟着参与到谈话中。侯普大概四五岁，有唐氏综合征，她的话难以理解。但是，她真的很讨人喜欢，笑嘻嘻的，充满好奇。侯普正在学习说话和使用卫生间。在老师翻译下进行的交谈，让我感到这个孩子真的很幸运，得以进入这个欢迎她的学校，老师和管理人员见到她的任何一点儿进步都感到高兴。

遵循《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的学校期待许多特殊需要学生达到与普通健全学生同样的标准。许多读者或听众首次知悉这种情况时，都感到震惊。决策者怎么可能发布这样的命令？有些决策者甚至在此引用所谓平等观表示，特殊需要学生如果不被要求和其他学生参加同样的考试，就会觉得被忽略了。你听到这种情况可能会感到疑惑：决策者对儿童究竟有无丝毫的理解，在发布《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的过程中有没有认真思考，该法案的理念似乎是“没关系，只要提高所有学生的考试成绩”。这种不动脑筋的态度还彰显于流行口号——“杜绝一切借口”！

如后所述，不加区别地要求特殊需要学生达到所有标准，对于学生和学校都具有高风险。在有些州，学生未通过一个高风险考试就得留级。在美国各州，只要特殊需要学生未达标，所在学校（这些学校里有相当数量的特殊学生）就被评价为未实现“充分年度进步”（Adequate yearly progress）。这种高风险不仅针对学生和学校，而且也针对管理者，管理者甚至可能因此丢掉工作。于是，毫不奇怪，管理者正在使用各种策略——有些策略在伦理上很成问题，借以避免其校内的特殊需要学生出现可能预见的失败。

一次我走访一所底特律的小学，正在办公室门口等校长。一个小男孩

从办公室里出来，他下巴吊着一块布垫，于是我问他是怎么回事。办公室里一个颇具同情心的秘书惜字如金地回答道：“牙疼，每天都这样。”我很惊奇这个小孩在数学课上可能怎样表现。“杜绝一切借口”这真是一个彻头彻尾不动脑筋的口号。这个孩子需要牙医治疗，而不是在数学课上接受更多专家的指导。

如果真正思考对当今学校的要求，可能会怀疑这些要求至少部分旨在使公民忽视那些困扰美国城市和一些糟糕的农村地区的社会问题。这些要求丝毫不管不顾儿童可能在家生活得糟糕，他们需要的可能是医疗服务和牙科服务，他们可能生活在对暴力的忧惧中，他们的父母可能正在坐牢或受虐待。一切都不要紧，“杜绝一切借口”，只要提高成绩。

把学习成绩当作进步标准，意在问责学校教师和学生。每位教师都必须对自己的业绩负责，每一次考试成绩都成了问责记录的一部分。为了保证大家认真对待问责制度，还出台了惩罚和制裁措施。学校到2014年必须证明：它们朝着100%优良的目标实现了充分的“年度进步”。换言之，它要求：到2014年每名学生必须娴熟地具备阅读和数学能力；五年内如果有学校未能实现充分年度进步，所受的惩罚将愈发严厉。在相关的年份未通过标准化考试的学生可能会留级或无法从高中毕业。（惩罚措施的具体落实因州而异。有些州让很多学生留级，其他一些州很少实施这种措施。）未达标学校的老师和教育管理者可能被调走甚至被开除，因此保障问责制度的考试都是“高风险考试”。

对话至此，认真思考的读者和参与对话者可能已萌生出很多问题。教师只应对考试成绩负责吗？他们就不用对获得好成绩的手段负责吗？如果学生憎恶学习，如果教师被去道德化，就不该有人对这种结果负责吗？学校只需要对具体的学习结果负责吗？学校是否也应对学习内容负责呢？从强调输入转为强调输出（或结果），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需要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是，关于输入的标准是至关重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关注赋予学生的教育机会。是否必须尝试保留一些可贵的超乎预先规定的学习成果呢？是否应该担心由于关注预先规定的标准而变得单薄的课程呢？在“问责”一章中将深入讨论这些问题。

如果学校不得不对考试成绩负责，我们就必须过问考什么。这就引起更多的忧虑。学校，尤其是弱校或少数族裔学生比较多的学校，现在的普遍做法是只教要考的东西。当然了，教师自然不能教具体的考试内容，但是他们被诱导将每一次课都与具体标准紧密结合。正如当前的改革运动所

描述的那样，这些标准是关于内容的陈述。正如黛安娜·拉维奇（Diane Ravitch, 1995, p. 12）说明的那样，“内容标准（或者课程标准）描述出教师应教什么以及学生应学什么”。当前改革运动的大部分支持者都坚持执行高度具体化的标准。教师必须精确知悉他们必须教什么，学生必须精确知悉自己必须学什么。请注意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之下，人们经常能回答“约翰尼是否学会了××”这个问题，但是无法回答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约翰尼学到了什么”。这个体系丝毫不鼓励教师邀请学生来探索不同的兴趣，了解广泛的主题，也不支持教师为学生呈现可学可不学的精彩内容。本书关于“标准”的一章将更多地讨论这些问题。

上述标准的描述可能使智性读者感到不悦和难以接受。他们可能抱怨：这不是平常所谓的标准的意涵；我们一般使用该术语是指首先设计、提出产品和大致的内容，然后思考每位生产者或相关生产者应该达到的标准。也许一套这样的内容标准可以作为课程标准？在这个程度上，我们或能宽容地接受。但是，一想到只有单一的课程标准，我们就无法抗拒不悦感——单一的标准怎么可能满足所有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它会不会扼杀创造性和想象力？我们将深入地讨论此问题。

除了内容标准，学校还必须要有业绩标准，即基于学生的表现来评价学校和教师。《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允许各个州设置自己的业绩标准。这种做法是合适还是怪异，值得讨论。在一个尊重各州教育监管权的国家，这种做法看似合适；但与《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其他条款相互参照来看，则又显得怪异。例如，在墨西哥州被评价为失败的学生，如果举家跨州搬迁到科罗拉多州，便立刻变成优良生。这种解决问题办法的标准算是全国性的优良标准吗？我们将看到有很多原因会逐渐导致这种潮流。

该法案还提到第三种标准——学习机会标准。这些标准的用意旨在描述学生和老师能获得的资源条件和授课方式，以达到业绩标准。联邦政府明确表示不愿意干预各州自办学校的权利，所以关于什么是完备的资源言之甚少。对该法案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又会感到不悦，考虑到《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干预了各州的教育权，联邦政府的决策者们有可能是真心不愿意规定学校教育的物质条件吗？或者其真正的担忧是提供完备的教育资源会花费联邦政府的资金？这都不要紧。杜绝一切借口！目前关于学习机会的思考在机会与执行单一课程标准之间画了等号。如果所有孩子都学同样的课程，都有高资质的教师（下文将不得不

讨论此问题)，那么他们就被认为获得了平等的学习机会。

《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虽然确实有安全标准方面的内容，要求学校必须汇报蓄意破坏财物、打架、性骚扰和其他威胁学生安全的违禁行为的数量，但是，在这里最深层次的问题依然被忽略。我们必须问：为什么今天需要这么多的保护措施——包括许多50年前闻所未闻的保护措施。为什么50年前的学校不需要保安、金属探测器（尽管这种设备那时已问世）？为什么50年前的学校不是出口紧闭、要求走廊安静、只安排20分钟的午餐时间？……现在这些问题人们一概不问，要求的只是更多的保护措施、零宽容规定，以及更严厉的惩罚措施。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绝不是说要回到50年前，而是应该要追寻最根本的问题，并深入探究：针对目前种种措施试图解决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揭示真正的原因所在？关于深层次的问题，能否做些什么？

既然《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如此重视考试，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考试应该以什么样的频率进行？对谁进行测试，应该如何汇报考试结果？应该考虑其他的评价方式吗？像侯普那样的唐氏综合征儿童，其进步应该如何评价？与考试相关的成本有哪些，这些钱有没有更好的去处？考试应该是被建构的，而且有场域意识。考试应该被设计得适合课程，还是应该允许考试毁掉课程？花钱开发试题、管理监督考试、给试卷打分、研究分数的分布、分析考试成绩，以及把所有信息搜集起来制成向公众公布的标准化的表格，所有这些都要花钱。是否应该以工作时间的的方式来计算考试的成本？从事考试工作的人员所得的报酬经常高于那些以创造性和耐心来培养像侯普这样的残疾儿童的教师。我们花钱的方式明智吗？

考试分数之所以被视为评价充分年度进步的主要标准以及问责制的主要标准，原因之一是：这些分数容易获得，被认为具有客观性，并可以完美地进行统计分析及制成数据报表。但是，恰恰是这些特点使得分数容易被操控，作弊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忧虑。已有报道揭露学生、老师和教育管理者作弊的情形，显然数据有时也会被地区办公室操控，而且相当多的时间被用于寻找政策的漏洞以及达到法令要求的方法和策略。如果这些报道属实，我们就只能得出如下结论：《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对公众教育具有诱发堕落的影响作用。一项法律如果使好人变坏、使坏人更坏，则是一条恶法。

我们许多人相信《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以及当前总体改革运动的最大错误在于：错误地理解教育目的，而且确实误解了教育的本质——